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析

张赛群

【内容提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应对我国当前贫困问题的基本方略。这一思想主要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大主题，并形成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位一体的扶贫体系。在实践中，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精准扶贫都有了较好的推动，从而既在实践中推进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又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有所贡献。

【关键词】精准扶贫 反贫困理论 扶贫模式

作者简介：张赛群（1975-），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福建泉州 362021）。

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就精准扶贫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形成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不仅推进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根据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定义，我国的贫困人口由1981年的7.3亿降到2005年的1.06亿，贫困发生率由73.5%下降到8.1%^①。我国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根据中国官方贫困线，2005年、200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分别为6432万、3597万，贫困发生率分别为6.8%、3.8%^②。由于统计口径不一，各方面的贫困数据存在较大的出入，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均明显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全球深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我国深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上。

虽然如此，但我国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出如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1)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我国贫困人口压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贫困标准（年均纯收入1274元），我国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年均纯收入2300元），我国贫困人口高达1.224亿^③。按照这一新标准，

① 方迎风、张芬《多维贫困视角下的区域性扶贫政策选择》，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② 方迎风《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当代经济科学》2012年第4期。

③ 《中科院发布〈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人口与计划生育》2012年第7期。

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2013年为8249万,2014年为7017万,2015年为5575万^①。可见,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庞大。而且,年均2300元的贫困人口标准仍然偏低。若以较高标准衡量,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将会更多。

与此同时,我国相对贫困问题也比较突出。近年来,地区、城乡、居民收入这三大差距不缩反扩。以地区人均收入为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差距不大。1978年人均GDP东部与中部之比为1.57:1,东部与西部之比为1.89:1^②。但之后随着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地区差距问题开始突显。至1998年东部与中部人均GDP之比达到1.81:1,东部与西部人均GDP之比更是跃至2.34:1。这表明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后来由于政府区域政策的调整,东西部差距才开始缩小。至2015年,东部与中部人均GDP之比减至1.53:1,东西部之比减至1.67:1。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各地生产力普遍有所发展,但农村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如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同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前者是后者的2.73倍^③。我国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这种状况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和谐,相对贫困问题容易使人产生“相对被剥削感”,进而对社会、对其他群体不满,衍生出社会不稳定因素。

(2) 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以人均收入的单一指标来测定。这种贫困标准易于操作,因而为很多国家所采用。但这种单一标准难以反映贫困人口吃穿住用等实际需要方面存在的困难,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人们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们对贫困的定义和解读也更加多元化,权利贫困、知识贫困等精神层面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显现,这将使扶贫问题更为复杂和艰巨。

(3) 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并存。制度性贫困是指社会制度造成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及就业、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特定地区、特定群体处于贫困状态;区域性贫困是指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一个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或社会生产传统等较为不利的地区;阶层性贫困是指某些特殊阶层的贫困问题,如当前城市中缺乏技能的农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目前,这三大贫困既是我国贫困问题的表象,又是各种贫困问题的成因。

我国贫困问题的成因还有很多,如绝对贫困问题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也可能导致相对贫困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私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都会拉大贫富差距;而个人观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个人的致富愿望和致富能力有所区别。总之,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我国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解决。

贫困原因的多元化使我国解决贫困问题十分不易,而扶贫方式、扶贫举措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影响到我国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处于“一穷二白”的普遍贫困状态,党和政府注重对贫困群体实行社会救济,帮助其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然而,单纯的社会救济治标不治本。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贫困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方面通过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实施社会救济兜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2015年),<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 洪名勇、洪霓《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底的同时,1987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了直接针对贫困地区(主要是贫困县)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试图通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从2001年开始,国家调整扶贫工作目标,把村作为新的扶贫对象。实践证明,这种依靠行政体系把扶贫资源传递给贫困县和贫困村的漫灌式扶贫做法虽然对于改变贫困地区的整体面貌有一定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民众温饱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也因信息、措施等不精准而导致扶贫成本高、效率低,贫困地区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如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实施期间,扶贫工作重点县不同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最低收入组与最高收入组的收入比从2002年的21.59%下降到2010年的17.38%,而且最高收入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更快^①。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国家也开始实施攻坚式扶贫,但一些政策由于不区分使用对象,对特定群体的帮扶效果仍然有限,我国整体扶贫形势仍然严峻。

总之,当前我国贫困形势不容乐观,扶贫工作难度也日益增加,这就需要转换扶贫理念,创新扶贫模式。

二、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对我国贫困问题进行大量调研和长期思考的基础上,2013年11月,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期间,他明确提出“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扶贫要求^②。同年10月,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将“精准扶贫”定位为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

从操作层面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主要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等四个环节。其中,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流程,要求防止目标偏移,保证瞄准扶贫对象;精准帮扶要求依照贫困户致贫原因和脱贫条件,以针对性办法扶持贫困群体;动态管理要求对扶贫工作进行实时跟踪和把控,根据扶贫进展及时调整;精准考核是保证“脱贫成效精准”的必要手段,及时对政策实施后的扶贫效果进行评估^③。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四者相互结合,连为一体,共同构成“精准扶贫”思想体系。

而从问题意识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主要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大主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者相呼应,共同构成精准扶贫工作体系。

1. “扶持谁”

“扶持谁”的问题首先与精准识别相对应,它包括贫困对象和贫困原因上的识别。在这一问题上,由于农村集中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加之农村自然环境差,贫困人口分散且观念落后,扶贫难度大。习近平首先将目光锁定在农村。他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④。他要求各地把帮扶困难群众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项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同时,他十分关注扶贫对象的精准性。他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群体

① 汪三贵、刘宋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习近平 《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年6月20日。

③ 唐任伍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人民论坛》2015年第30期。

④ 习近平 《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人民日报》2012年12月31日。

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① 在各类主体中，他强调要突出重点，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区域攻坚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

“扶持谁”的问题还与精准管理相对应。在确定好帮扶对象之后，习近平要求各地对贫困群体建档立卡，实行动态调整，该退则退。

2. “谁来扶”

“谁来扶”既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主体，又是精准考核的对象。

在“谁来扶”的问题上，习近平认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他再三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扶贫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鉴于以往因缺乏责任要求导致扶贫效率不高的现实，他要求加强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②。在扶贫实践中，他将关注焦点放在基层，要求加强贫困村两委建设，强调要充实一线扶贫工作队队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

同时，习近平也认为扶贫开发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强调要构建一种“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③。但同时他也强调政府在各种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贫困群众虽是脱贫攻坚的对象，但习近平也将其视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在开发式扶贫中，他强调要处理好国家、社会和贫困者自身的关系，要培育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他认为，要摆脱贫困，必须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精神。为此，他强调扶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的观点。2013年他在湘西考察时又表示“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④当然，他也十分注重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强调扶贫要先扶智，将教育视为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3. “怎么扶”

“怎么扶”即扶贫路径，与“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相对应。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认为先要找出问题所在，因而特别强调致贫原因的精准性。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强调要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贫困群体和贫困原因确定好之后，则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他提出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⑤来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

在不同时期，他还针对各种贫困原因提出过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如他提出，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针对贫困者缺乏脱贫信心问题，他提出，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他也强调对先天条件差、自身无法脱贫的群众，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保证其基本生存需要。总之，在习近平看来，要提高扶贫措施的有效性，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

① 郗凤芹、华正学《总体性视域下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析》，《农业经济》2017年第1期。

② 习近平《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年6月20日。

③ 习近平《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年6月20日。

④ 转引自《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6日。

⑤ 转引自《众志成城 脱贫攻坚》，《中国经贸导刊》2015年第34期卷首语。

他也十分强调扶贫措施的可持续性,要求各地建立长效扶贫机制,稳定脱贫措施,巩固扶贫效果。他还高瞻远瞩提出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问题,要求各地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①。

总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适合于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系统性。精准化是这一思想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要义,而精准化的要求也贯穿于扶贫工作的全过程。

三、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我国精准扶贫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都有了较好的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初步形成。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随后国务院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2014年4月)、《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201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1月)等纲领性文件,各地方政府也颁布了扶贫的具体措施。一些配套性政策,如2015年国务院《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等也相继出台。这些扶贫政策对精准扶贫的工作模式、工作布局、工作机制、具体方式方法等都做了详尽规定,标志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为今后的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精准识别工作顺利完成。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流程。2014年4月国务院扶贫办颁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要求在2014年年底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地区电子信息档案,并向贫困户发放《扶贫手册》。以此为基础,构建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为精准扶贫工作奠定基础。如今,全国12.8万个贫困村、3000万个贫困户和9000万个贫困人口已全部完成了贫困建档立卡,有关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镇的各项综合信息档案已经建立起来,从而使帮扶对象精准化程度大大提高^②。

第三,扶贫组织基本到位。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十分注重扶贫工作的组织保障,并确定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层层落实扶贫责任,明确责任追究机制。这种管理体制十分强调党政一把手工作责任制,目前,在贫困面大、贫困问题严重的省、市、县,均由党委书记和政府第一把手直接部署脱贫攻坚任务,督促落实各项扶贫措施。在基层,驻村帮扶工作队也已基本到位。同时,由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明确了各地扶贫脱贫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并将这些目标和任务一一分解到人,从而增强了具体帮扶人员扶贫脱贫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已基本形成。目前,各级党委和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乃至海外侨胞都积极参与到我国精准扶贫事业当中,从而为贫困地区2020年如期脱贫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四,各种精准扶贫模式相继出现。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指导下,我国各贫困地区积极行动起来,因地制宜,创造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广东“双到”模式(规划到户、责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15年3月9日。

^② 张琦《通过精准扶贫完成扶贫脱贫任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2期。

任到人),江苏“分类精准扶贫”,陕西“三五”模式(划分“五种类型”,实施“五大工程”,建立“五项机制”),贵州的“四看”精准识别法(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甘肃省“联户联村”的双联模式、“六精准”(对象、目标、内容、方式、考评、保障)和“1+17”扶贫模式(一个目标和17个专项精准扶贫工作方案)等。这些精准扶贫模式既有效推进了当地的扶贫脱贫工作进程,也为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借鉴。

第五,扶贫成效显著。“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由于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以及党和政府因村因户实施不同的扶贫举措,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就全国层面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2016年期间,年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①。在地方层面,根据2015年对贵州、陕西、广西、内蒙古、甘肃、云南、湖北等地的实际调研,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调查村的农户收入提升了28%以上,产业收入和创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农户生计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大大提升,调查村脱贫时间平均提前了1.8年^②。

如今,各地脱贫已进入倒计时。继国家提出2020年脱贫规划后,各地也纷纷拟定了其脱贫计划。如四川省出台了《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退出实施方案》,制定了脱贫计划,并为脱贫摘帽明确了多元标准。一些地方还确定了具体的退出时限,如河北省定出了2018年基本消除贫困问题的方案,而宁夏固原区政府还制定了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精准脱贫的具体退出方案。这表明了各地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四、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意义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提出来的,有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现实意义方面,首先,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生活将更加殷实,各方面需求也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然而,2020年离现在仅几年时间,我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却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就使得扶贫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7年2月他再次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庄严承诺。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③。而从近几年脱贫数据来看,精准扶贫的做法可以保证2020年脱贫任务的完成。因此,精准扶贫关乎我国数千万民众的福祉,关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

其次,精准扶贫思想促进了我国当前扶贫治理体系的完善,加强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治理能力。传统的扶贫方式能有效地解决泛贫困现象,但因扶贫对象和措施不精准而对特定群体的帮扶作用不大,扶贫效率不高。当前,我国泛贫困问题已基本解决,贫困问题正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加,以往的扶贫思路与方法已难以适应当前扶贫工作的需要,因而迫切需要对原有的扶贫治理体系和扶贫治理能力进行完善。在此情况下,精准扶贫思想应运而生,并因其精准性特征和

① 《习近平重要论述摘要》,《中国民政》2017年第4期。

② 张琦《精准扶贫助推我国贫困地区2020年如期脱贫》,《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64期。

③ 参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党建》2017年第3期。

系统性要求而对以往的扶贫治理体系有所完善,对党和政府的扶贫能力也有了新的要求,因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扶贫治理体系和扶贫事业的发展均有重要的意义。

在理论层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前者主要体现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扶贫目标、致贫原因、扶贫主体、扶贫内容等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表明了其追求共同富裕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反贫困目标。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对立、城乡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都将消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且由于这一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①,因而,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就为未来社会的按需分配和普遍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共同富裕是中国历届政府的不懈追求,当然,共同富裕也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在致贫原因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也注意到一些其他可能致贫的因素,如自然和地理因素。他指出,“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②,这对于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人们的贫富程度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中国扶贫实践,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充分注意到了自然和地理环境对区域贫富差距的影响。习近平多次强调,扶贫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扶贫要“因地制宜”,必要时“易地搬迁安置一批”;在扶贫主体和扶贫内容上,马克思多次强调贫困者的政府救济,同时他在分析无产阶级贫困时对人的主体性也十分强调。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最终要依靠自身的解放,才可能真正地摆脱贫困。而在精准扶贫的“大扶贫”框架中,习近平也再三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③等扶贫思想,这种“扶贫必先扶志”的思想实际上和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有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来源。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对社会主义贫困理论作出的贡献。

一是对社会主义贫困问题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加之分配方式合理,因而不存在普遍贫困问题。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否定或讳言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致使我国的反贫困研究一度乏人问津。但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中国并未经历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力基础仍然较为薄弱,贫困问题也较为普遍。在我国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同志较早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他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④从而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高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再三强调,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不发达,因此反贫困也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贫困问题的思路,而且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1999年6月,习近平在福建宁德等地调研时强调:福建省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但“相对贫困还长期存在”,对此应引起重视。同时,他也和邓小平一样站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看待反贫困问题,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0-241页。

③ 转引自《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6日。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①。这些观点对社会主义贫困思想有所充实和完善。

二是对反贫困的艰巨性和阶段性有充分的估计。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之后，“共同富裕”的目标被多次提及和强调，习近平对共同富裕有更为直观的解释。2016年2月，习近平在江西农村考察时强调“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②这是习近平对共同富裕的阐释，也是他对精准扶贫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阶段性有充分的估计，2017年2月他提出，今后几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且越往后越艰巨，因为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因而脱贫难度更大。基于对脱贫艰巨性的认识，他将精准识别、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分开，强调了扶贫工作的阶段性。他把当代中国脱贫的时间定在2020年，但同时又强调各地“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要量力而行、真实可靠、保证质量。

三是对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途径有了更多的探索。要打赢社会主义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1）强调找对“穷根”、精准扶贫。相对于以往那种粗放式扶贫方式，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不仅要求“扶对人”，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而且要求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弄清楚，以便有针对性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这有利于保障贫困群体彻底脱贫。（2）对长效扶贫更加关注。习近平十分关注扶贫问题的可持续性，他经常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和扶志，他还从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高度提出必须抓教育，这些均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在扶贫工作机制上，他强调要建立长效扶贫机制，要保证扶贫资金、人员、项目、政策的可持续性。（3）强调扶贫工作的系统性，他将扶贫分为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四个过程，要求在扶贫工作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针对以往较为忽视的考核环节，他再三强调责任制和反馈的重要性。在2016年两会期间，他还要求“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要抓反馈”。

总之，习近平基于当代中国贫困问题的种种探索，既是对我国过去数十年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提升，又是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十分有益，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也有借鉴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 [3] 习近平 《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 [4] 方迎风 《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当代经济科学》2012年第4期。
- [5] 洪名勇、洪霞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 [6] 许友伦 《资源配置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管理学刊》2015年第5期。
- [7] 汪三贵、刘未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 [8] 任仲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

（编辑：张建刚）

^① 任仲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308页。

^② 转引自杨森 《习近平上井冈山：扶贫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北京青年报》2016年2月4日。